

三民叢刊

潘重規著

紅學六十年



紅學六十年

潘重規著

三

民

叢

刊

15

三民書局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紅學六十年／潘重規著.--初版.--

臺北市：三民，民80

面； 公分.--（三民叢刊）

ISBN 957-14-0067-X（平裝）

1.紅樓夢-批評，解釋等

857,49

79001555

◎ 紅 學 六 十 年

著 者 潘重規

發行人 劉振強

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郵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

編 號 S 82055

基本定價 叁元伍角陸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0067-X（平裝）

紅學論集序

一百年前，我國大詩人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先生對日本漢學家說：「《紅樓夢》乃開天闢地，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，當與日月爭光，萬古不磨者。恨貴邦人不通中語，不能盡得其妙也。論其文章，宜與左、國、史、漢並妙。」這一番話，在今天似乎可獲得全世界文學者的首肯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四十年前，在外交界服務，和歐美人士一次聚談中，有人提議舉出心目中認為最好的一部文學作品，結果得票最多的竟是中國的《紅樓夢》。這雖然是一時遊戲，未必便成定論，但由此可見《紅樓夢》是多麼受中外人士的愛好，它吸引讀者的力量又是何等鉅大！

在我記憶中，進入中學時，我已經成了一個紅迷。腦海中終日盤旋著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情影，恰如棋迷腦海中充滿了黑子白子一般。那時不但不會問曹雪芹是什麼人，根本就不理會作者是什麼人。我只覺得這部小說具備一種吸力，它把我整個心靈都攝收到作品的一字一

句當中。因此，一卷《紅樓夢》常常會逗得我廢寢忘餐，不忍釋手。看到傷心處，便覺滿紙閃爍著晶瑩的淚珠；看到歡愉時，便覺眼前展開溫馨的笑靨。遇到動人心魂的字句，咀嚼玩味，有時十天半月都不能放下。真正像香菱學詩的時候說的：「念在嘴裏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！」試問，幾千斤重的橄欖，這一輩子如何能咀嚼消受得盡呢？而且我每次讀《紅樓夢》，總覺得作者有一段奇苦鬱結的至情，乍吞乍吐，欲說還休。他口口聲聲說：「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，故將真事隱去。」又說：「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。……其間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，俱是按迹循踪，不敢稍加穿鑿，至失其真。」但讀遍了全部《紅樓夢》，提到年月朝代處，從沒有大清字樣。甚至歷敘古今人物時，說什麼「近日之倪雲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」（第二回），簡直像是明朝人的口吻，令人興「不知有清」之感。作者寫作的時代，爲什麼要藏頭露尾，閃閃爍爍；既不在書中說明，又不在書外標出呢？這是我沈醉於《紅樓夢》之後，帶來了這類不少的困擾，真有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」之概。到了民國十三年，遊學南京，這時值蔡元培、胡適兩先生紅學論戰之後，得讀蔡先生的《石頭記索隱》、胡先生的《紅樓夢考證》。知道蔡先生的主張是：

《石頭記》者，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，書中本事，在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，寓痛惜之意。

胡先生則確定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是曹雪芹。他的結論是：

《紅樓夢》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，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卽是曹雪芹的化身，甄賈兩府卽是當日曹家的影子。

這一次的紅學論戰，胡先生獲得全勝。例如他駁斥蔡氏劉姥姥是湯潛庵的說法，真是痛快之極。胡先生又發現脂評《紅樓夢》抄本，斷定刻本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，後四十回是高鶚的偽造。胡先生認爲這是歷史科學考證方法的成功。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。魯迅的《小說史略》，乃至日本歐美，差不多整個世界談《紅樓夢》的全都採用了胡先生的學說。從民國十年以後，說得上是「定於一尊」的「胡適時代」了。那時我剛進入大學中文系之門，感到浩瀚無涯的學海，真是望洋興歎。在師長督導之下，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，那有閒暇日去瀏覽小說。因此蔡胡二先生一場激烈紅學論戰，似乎不會在我心上發生震盪，也未引起我研究《紅樓夢》的興趣。不過在中學四年級時（那時是舊制中學，修滿四年畢業），很愛好張蒼水、顧亭林的詩文，課餘時，總是手把一篇，自吟自賞。考進大學後，更喜涉獵顧黃王三先生的著作。又縱觀南明野史，以及清代文字獄的檔案。發現亭林諸人詩文集中，凡涉及清代年曆，皆絕而不書，甚至誌墓之文，如生卒年月，非明白寫出不可的，也千方百計，委婉曲折加以表明，決不肯寫出滿清朝代年號，以表示他們不屈服異族的志節。如顧亭

林〈歎王君墓誌銘〉云：「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，後三年國變，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，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，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。與王生交一年，而王生以狀請銘，不孝以母未葬，弗敢作也。又一年，卜葬，葬有日，而王生復來請銘，不孝不獲辭而銘之。」像這一類屬辭的方法，皆因作者苦心隱痛，務屏夷清的僞曆，不得干華夏的正統。這使我觸悟到《紅樓夢》作者不肯寫明著書的朝代，正和亡國遺民抱著同樣的情懷。我看了許多南明野史和文字獄檔案，又發現清初這一段時期，無論是文人學者，江湖豪俠，凡屬反抗異族的志士，都是利用「隱語式」的工具在異族控制下秘密活動。清文字獄的檔案中，有一件是劉墉搜出丹徒生員殷寶山的詩文，乾隆的上諭說：「至閱其內〈記夢〉一篇有云：『若姓氏、物之紅色者是。夫色之紅非姓之紅也，紅乃朱也』」等語，顯係指稱勝國之姓，故為徽國之語以混之，尤屬狡詭！該犯自高曾以來，即為本朝臣民，食毛踐土，乃敢繫懷故國，其心實屬叛逆，罪不容誅。」看了這段話，使我聯想起《紅樓夢》第五回，警幻仙曲演紅樓夢；第十二回，真真國女子「昨夢朱樓夢，今宵水國吟」的詩句，對照起來，分明是把紅字代替朱字，這是不是「繫懷故國，其心叛逆」呢？明崇禎殉國後，號稱易堂九子的魏禧諸人，選擇了江西寧都縣的翠微峯，做他們革命的根據地。他們讀書講習的場所，號稱為易堂。《說文》解古文「易」字是日月相合，日月相合便是「明」。彭躬庵的《易堂記》說：「丁亥，合坐

讀史，爲筆記。爲詩，詩一遵正韻。是冬，諸子言易，卜得離之乾，遂名易堂。……山居屋有五，易堂爲公堂，左右室並列。」這段話用隱語說明「易堂」卽是明代的朝廷。因爲《易經》離卦是光明的象徵，它的彖辭說：「離，麗也。日月麗乎天，重明以麗乎正。」象辭又說：「明兩作離，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」「重明」、「繼明」卽是「復明」的意義。他們以「易堂爲公堂」，公堂卽是朝廷的意思，也算是他們革命政府的象徵。易堂諸子作詩用正韻，正韻乃是明太祖敕撰的《洪武正韻》，作詩用明韻，正是他們反抗清朝的表示。乾隆十八年又曾經發生一樁怪案，一個名叫丁文彬的，自稱皇帝，忽然要傳位與曲阜衍聖公，文字獄檔案留有他造曆書的口供單說：「小子只有一個人著書抄寫，因上帝命我趕修這《洪範春秋》，故此不能再有工夫造這新書了。直到卽位六年上才造起的，只造得三年，並沒隱藏別處，那大夏是小子國號，天元是年號，小子因做得一無好處，去年因請命了上帝，把天元改作昭武，傳位與小聖公的。既有年號，就寫欽定了。至於書面上寫大夏大明，那是取明明德的意思，大夏是取行夏之时的意思。」看了這段供詞，又觸發我對《紅樓夢》的疑問。《紅樓夢》第十九回，作者從寶玉口中發出一番議論說，除明明德無書，以寶玉的爲人，他最欣賞的書應該是《西廂記》、《牡丹亭》，爲什麼最崇拜的會是《大學》？就算是最崇拜《大學》了，爲什麼不說「除《大學》外無書」，而偏要說「除明明德外無書」！這會不會是丁文

彬所說「大明取明明德的意思」的革命術語呢？我在未了解《紅樓夢》運用隱語涵義以前，我對於《紅樓夢》的文辭意義，發現許多疑問和矛盾，等到了解隱語涵義以後，便發現《紅樓夢》作者確是「持民族主義甚摯」，對於胡先生的說法，反而覺得觸處難通。我的看法，簡括來說，賈寶玉是代表傳國璽，代表政權，林黛玉影射明朝，薛寶釵影射清室。林薛爭取寶玉，即是明清爭取政權，林薛的得失，即是明清的興亡。賈府指斥偽朝，賈政指斥偽政。所以我的結論是：《紅樓夢》確是一部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。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復明。書中對賈府施以無情的攻擊，罵他們爬灰養小叔，即是攻擊文太后再嫁皇叔多爾袞的醜行。我們試想，以一個倫理觀念極重的中華民族，把統治我們的清帝的禽獸穢行揭發出來，此一宣傳，激起反清的力量該多麼大！作者又在書中反覆指點真假，既有賈（假）寶玉，又有甄（真）寶玉，真假兩寶玉，面目雖是一般，但政權在本族手裏就是真，政權在異族手裏便是假。因此清朝是偽，明朝就是真。真的必然會復興，偽的注定要失敗。寶玉說「除明明德無書」，這是作者嚴正的表示，明朝纔是正統。能明瞭明朝之德，便不可出仕偽朝。所以他極力抨擊讀書求官的是國賊祿蠹（第十九回、第卅六回）。有人說解釋寶玉為傳國璽是穿鑿附會，其實不然。我們細看作者穿穿插插，隱隱約約的告訴讀者，石頭就是寶玉，寶玉就是傳國璽。他首先在第一回敘述青埂峯一塊石頭，鍛鍊通靈，「須得再鐫上幾個字，便是件

奇物。」因為印璽是必須有文字的。又從甄士隱夢中，指出這石頭原來是塊美玉。第八回更從寶釵的口眼中詳細描寫這塊美玉，形體大小和《三國志·孫堅傳注》中所載漢傳國璽相同。玉上「莫失莫忘，仙壽恆昌」的刻字，更是漢傳國璽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的翻版。爲了印璽必須用硃，所以作者的靈心，便憑空捏造出今古無雙的愛紅之癖來。書中第九回、十九回、廿一回、廿三回、廿四回，頻頻提及寶玉愛喫胭脂，原來是從玉璽要印硃泥設想出來的。至於胭脂作何形狀呢？試看平兒到怡紅院化妝時，見到的胭脂，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，「裏面盛著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。」這又是作者暗示胭脂即是印泥。試想，一塊玉石鑄上傳國璽的文字印上硃泥，這不是明白告訴讀者，寶玉就是傳國璽嗎？

以上這一派見解，蟠踞我胸中，直到民國四十年，來臺灣師範學院任教，那年五月間，在戴靜山教授家，和董同龢、陳致平諸先生閒談，偶然提到我對《紅樓夢》這番看法。沒料到隔不幾天，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生會羅錦堂會長，奉董同龢教授之命，來到我的宿舍，邀我五月廿二日去臺大作一次學術演講，指定要我講對《紅樓夢》的看法。那次講題我定爲「民族血淚鑄成的《紅樓夢》」（講詞在《反攻雜誌》發表）。我認爲《紅樓夢》原作者不是曹雪芹，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，後四十回也不是高鶚僞作。這是胡先生考證《紅樓夢》三十年後，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學說。果然，經過不久，胡先生在《反攻雜誌》第四十六

期刊出了〈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〉認為我「還是索隱式的看法」，「還是笨猜謎的方法」，「全不相信辛苦證明的《紅樓夢》版本之學」，「全不接受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敘的歷史看法」。我爲了答覆胡先生，曾讀遍胡先生研究《紅樓夢》的全部著作，也曾深切反省研究《紅樓夢》的方法。我在答覆胡先生的文章中（也在《反攻雜誌》發表），再度提出證據，證明胡先生的錯誤。並寫下了這麼一段話：「我很感謝胡先生，他指示愛讀《紅樓夢》的人說：『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，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，著者的事蹟家世，著書的時代，這書曾有何種本子，這些本子的來歷爲何。這些問題乃是《紅樓夢》考證的正當範圍。』我覺得，除了胡先生所說之外，我們還須熟讀深思，涵泳全書描寫的內容和結構；我們還須高瞻遠矚，洞觀整個時代和文學傳統的歷史背景，庶幾能體會到《紅樓夢》作者的苦心，纔不致抹殺這一段民族精神的真面目！」

爲了要明白《紅樓夢》的真相，三十多年來，我努力搜羅《紅樓夢》的版本和資料。在香港新亞書院，創設「《紅樓夢》研究」課程，刊行《紅樓夢研究雜誌》。又受好奇心的驅使，一九七三年的秋天，在巴黎東方學大會閉幕之後，曾經闖入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（簡稱東方院），披閱所藏舊抄本《紅樓夢》。東方院孟西科夫教授說我是從外國來看這個抄本的第一個中國人，並且認爲我研判的結論，糾正了他們鑑定的偏差。作爲一個中國人，

我覺得是不虛此行的。這個抄本，淪落在異域一百六十年，初次見到探訪它的本國讀者，真忍不住要相對嗚咽了。近二十多年來，不斷有新版本、新材料發現，我也和海內外紅學家，如俞平伯、周汝昌、吳恩裕、吳世昌、趙岡、馮其庸、余英時諸先生不斷的有辯詰討論的文章。總結來說，一切新版本、新材料的發現，不但不曾動搖我基本的看法，反更增強我確切的信念。我現在還要重覆我在《紅樓夢新解》所說的話：「假如我們看清楚這書的時代背景，鑑定這是一部民族搏鬥下的產物，熟識黑暗時代大眾默認的革命術語，我們再細讀此書時，耳中便彷彿聽見民族志士的呼號，眼中便彷彿看見民族志士的血淚。至於《紅樓夢》在文學上的成就，無疑的，它已經在競走場中奪得了錦標。如果事後發現這個奪錦標的選手，並非和同伴同樣的空著手競走，而且還揹著一個極沈重的包袱，我們對這個任重致遠的選手，除了驚訝他超羣絕倫，越發加深崇敬外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！」愛國史學家連雅堂先生告訴我們：「臺灣民間風俗，農曆三月十九日是太陽節，家家戶戶點燈，意思是追求光明，就是要永久勿忘明朝的『明』字，這一天原是崇禎皇帝殉國的日子，也可當作一個民族紀念節。」看清楚了臺灣的革命史實，了解了臺灣曾遭受異族宰割，太陽節的「燈」，確實是照亮了無比的民族精神，蘊含了無限的民族血淚。假如忽略了臺灣太陽節的背景，不也同樣會遭人詬誶，變成《紅樓夢》索隱派的笨猜謎嗎？

幾十年來，我從《紅樓夢》一書中所窺見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光芒，一直閃爍在我心中。我不敢說我的知見是真知灼見，但在沒有證據證明我的錯誤時，我也不敢放棄我所看見的民族精神。因此，幾十年來，和胡適之先生以及紅學專家，發生了無數次的論辯，著眼都在保衛這段民族精神上。論辯的文字，已結集的有《紅樓夢新解》、《紅樓夢新辨》、《紅學六十年》三書。還有歷年來未加結集的論文，散見海內外報章雜誌。門人友好頗以散佚爲憾，並慫恿搜集成冊。適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重視學術，願爲出版流通。因將《紅樓夢新解》、《紅樓夢新辨》、《紅學六十年》三書重加校正。又結集歷年來論文爲《紅學論集》一冊，合併付印。我有幸得此機會向海內外讀者傾吐我的心聲，在此，我竭誠渴望能得到解開我七十年來疑結的指教！

潘
重
規

紅學六十年 目次

紅學論集序

紅學六十年

讀列寧格勒《紅樓夢》抄本記

論列寧格勒藏抄本《紅樓夢》的批語

《紅樓夢》的纂成目錄分出章回

《近年的紅學述評》商榷

「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」答余英時博士

附 錄

近年的紅學述評

關於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	一七一
由潘重規先生《紅樓夢的發端》略論學問的研究態度	一八七
誰「停留在猜謎的階段？」	二一三
敬答中文大學「紅樓夢研究小組」汪立穎女士	二二九
吾師與真理	二五一
紅學討論的幾點我見	二五九
論《紅樓夢》研究的基本態度	二六三

紅學六十年

研究《紅樓夢》已經成爲一門學問，而且「紅學」這一名詞，也已取得海內外學術界的承認，似乎不須在此多加解說了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我在香港曾作一次講演，講題是「紅學五十年」。我認爲自從民國六年，蔡元培先生刊行了《石頭記索隱》一書，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。胡先生寫的《紅樓夢考證》，的確和清儒治經方法非常相似。而且經論戰以後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。因此不斷的蒐求新資料，發掘新問題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。所以我認爲真正的紅學，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。我講「紅學五十年」，即在說明自民國六年至民國五十五年整整五十年的紅學發展，同時也提出了我個人發展紅學的計畫。今天我的講題是「紅學六十年」，意思著重在續講近十年紅學的發展。不過講述近十年紅學之前，似乎有簡單補敘前一段時期的必要。

我們知道蔡胡論戰的時期，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，胡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，都是受國際學術界重視的人物。因此，這次論戰特別轟動。論戰的結果，胡先生的主張，可以說得到了壓倒的勝利。簡單說來，蔡先生認為《紅樓夢》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，書中本事，在弔明之亡，揭清之失。書中人物，多影射漢族仕清名士。胡先生則認為《紅樓夢》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。他指斥蔡氏考定劉姥姥是湯潛庵一類的詁難，痛快淋漓，使蔡先生無詞以對，他又考得曹雪芹的家世，發現脂評《紅樓夢》抄本，故斷定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，後四十回是高鶚所偽造。胡先生認為這是歷史考證方法的成功，因此博得一般學者的信從。魯氏的《小說史略》，以及日本歐美甚至整個世界談《紅樓夢》的人士，全都採用了胡先生的學說。民國四十六年，我參加在西德舉行的漢學會議，當我發表對《紅樓夢》作者的意見時，一位外國教授即起立發言，認為胡先生的說法已成定論，不容再加批評。可見這幾年來，說得上是定於一尊的「胡適時代」。但在民國四十年，我對胡先生學說提出懷疑，可能是胡先生學說受到搖撼的開始。過去蔡元培容庚雖然提出異議，但經胡先生反駁後，便聲氣消沈。而我提出的問題，胡先生卻始終未能答復。在那年的五月廿二日，臺大中文系學會邀我作一次紅學演講，我提出了我的具體意見。簡單說來，胡先生重要的主張有三點：

一、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；